

新
建
筑

NEW

architecture

ISSN 1000-3959 CN 42-1155/TU

06/2013

复杂性 与 转变中的城市设计

Complexity vs. Urban Design in Transition

新城市设计：建筑学的社会理论？ / 亚历山大·R·卡斯伯特

当代社会变迁中的城市设计 / 董明

辨新城市设计 / 阿里·迈达尼普尔

资本空间化过程中的城市设计：一个分析性的框架 / 杨宇振

消费主义、城市品牌化与城市设计 / 乔恩·朗

作品集辑：杨泰雨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文化性转变？ Is a Cultural Tur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ssible?

1 德国埃森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园区 (Rem Koolhaas, 2008)

马蒂娜·布希耶

Martine Bouchier

万励译 杨宇振校

Tr. by Wan Li Proofread by Yang Yuzhen

摘要 论述了城市文化性作为一个长久被忽略的价值维度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文化是城市变革的催化剂，是城市精神、活力和吸引力的源泉。当代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将物质和技术作为核心，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破坏和缺失。作为城市集体记忆载体的城市公共空间，在传承城市文化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通过将城市文化、公共艺术与城市空间改造相结合，我们可以加强地域归属感，保护当地文化的多样性。以一种探索性的方式论述了文化性转变对于实现城市可持续性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对社会草根阶层生活方式、行为模式、文化标识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城市的社会结构，以实现一种以人为本、尊重地域文化与记忆的城市发展模式。

关键词 公共空间 文化 可持续性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alidity of the idea that Culture can be a way to give to the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new orientation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habits, memory and representations. Culture in general and especially the living culture are a lever of the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a patrimonial activator, a source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can bring dynamism, contemporaneity and attractiveness to the city. As it is thought and applied today, the principl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essentially technical. The risk of this position is that the intangible heritage will be lost for the future generation. Thus,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take account of the couple "culture/heritage" in the dynamic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grating the living culture could heighten the identity sense as well as the social usage of the public places to which is linked the memory. A cultural tur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uld give a heuristic legitimacy to what constructs the memory of a district, not only the remarkable buildings, but also the habits and the stories of ordinary inhabitants. It includes the life style, the collective practices and gives a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presentations, to imagination and to speeches. The paper advocates for a development involving a bigger consciousness of the memory shared by people and which constitute them in an organized community.

KEY WORDS public space, 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0-3959 (2013) 06-0044-06

作者单位：法国高等国立巴黎瓦尔德塞纳建筑学院 (CRH-LAVUE)

世界各地的城市正在不断向外扩张。城市发展所具有的两面性在于：一方面，城市边界扩张导致城郊乡村逐渐城市化，城市旧工业区经过再开发转变为现代的中产阶级住区；另一方面，部分历史住区因长期缺乏维护而日渐衰退。

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城市住区的空间结构和社会属性也在发生转变。城市公共政策的决策者们需要同时面对城市经济发展、保障城市服务功能和保护生态环境等诸多挑战。以法国为例，为改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面貌，决策者常采用城市物质环境改造的方法，对原有的城市空间进行置换。虽然这种城市更新策略由于效果显著受到决策者的欢迎，甚至在短期内得到当地居民的好评，但该政策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期影响却常常被忽略。随着一幢幢新建筑拔地而起，老城原有的空间肌理、路径和景观已消失殆尽；而随着这些城市细节一起消失的是市民们对城市的共同记忆和当地居民特有的归属感。起始于2007年，由“大巴黎项目发展公司”和“大巴黎国际工作营”主持的大巴黎（Great Paris）项目正是该类城市更新政策的典型代表，其所提出的大尺度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开发项目可能对当地住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巨量化（massification）和均质化（homogenisation）是现代城市都市化的显著现象。为了维系都市的自我存在，城市往往描绘出一幅强烈的繁荣景象；均质化的城市形态让外来者可以很快识别出“城市”的存在。传统城市的特异性（singularity）和暗含的城市文脉往往被统一的城市意象所取代。新近的《文化视角下的大巴黎》报告以一种宽广的城市视野重新审视大巴黎项目，强调了城市“领域文化”（territorial culture）^[1]的重要性。领域文化包括特定区域内的文化多样性、身份认同和共同记忆。从领域文化的视角重新认识场地，有助于我们在改造城市物质环境的同时，实现领域文化的价值再生。在深入探讨城市的领域文化之前，我们须要面临一个核心问题：在城市改造计划中整合艺术和文化项目能否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维护区域社会文化多样性和提高社区归属感？

在城市改造计划中整合艺术和文化项目能够保持领域文化的活力，保存居民对城市空间的共同记忆，并通过提高领域文化遗产吸引力的方式鼓励年轻一代将这种共同回忆不断传承下去。基于领域文化的城市更新原则关注文化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将城市规划实践与其所传达的社会内涵

作为城市分析的核心问题。在该思想的引导下，城市文化成为可持续性城市发展策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德裔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写道：“在人类社会，只有艺术家才是唯一具有独特思维的个体。使得艺术家如此特殊的并非其创作过程中的主观性，而是他们是客观世界的真正创造者。他们所创造的客观世界往往超越文明本身的存在，以经典的方式永存并历久弥新。”^[2]

一 城市与文化

文化，与经济、贸易和各种社会关系一起，以物件（objects）、场所和行为个体（actors）的形式构成了城市这个复杂的有机体。植根于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文化，如同艺术一样，具有极其广泛的定义。街头艺术、年轻人所喜爱的涂鸦和嬉皮士文化、多种族混居、各种地域性的标志与符号，都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这些文化现象与城市历史、环境一起，成为我们感知城市空间、塑造场所共同记忆的直接对象。评价一座城市的文化性有一套客观的标准，其评价项包括：人口和经济发展指数、政治中心性、是否具有国际或国家级的文化设施、城市场所的多样性、艺术创造力、是否具有有一定规模的本地艺术市场等。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国际化程度和政府对于艺术产业的扶植程度等，都是决定一座城市文化性的重要因素。“文化之都在吸引各种艺术家到来的同时，还通过举办展览和出版作品的方式向全世界推广其文化。一座文化繁荣的城市是联系各个城市的纽带，其独有的文化创造力使之成为艺术和时尚的中心……”

位于德国的“鲁尔造”（Ruh Gebeit）项目是欧洲在旧工业区再开发中尊重地域文化、实现文化价值再生的典型范例。城市的区域文脉是一个复杂的多层体系，包括城市经济、生态、社会和历史等各个层面的信息。居民习性、民俗传统、建筑遗产、自然和景观系统，这些都是空间社会化过程中重要的构成要素。城市中丰富的文化遗产能够促进人们与城市空间的互动。以德国“国际建筑展”（IBA: International Bau Ausstellung）计划为框架，“鲁尔造”项目在20年的项目周期内，将一片原先破败不堪的重工业矿区彻底转变成了一片具有生态、文化、经济、教育功能和传承意义的城市新区。艺术产业、土地净化、生态可持续性、运动与休闲，已成为鲁尔地区在经

历区域物质、文化改造后的新主题（图1）。

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1%计划”（One Percent Measure, PEM）首次提出了将艺术与城市公共空间相结合的规划管理。该导则建议，每个公共建筑项目（学校、车站、博物馆、市政厅等）都应将1%的总建造资源用于场地上的艺术文化建设。该计划在1972年法国政府的城市扩张和新城建设项目中得到了首次实施。首先在当时兴建的具有艺术气息的城市公共空间留存至今。在*Thinking Cities by Contemporary Art*和*Reinventing Cities*中有对法国城市的公共空间文化性的详细论述。

上述的法国城市空间改造项目致力于改善城市户外空间的质量，为城市中心和城郊居民提供适宜的活动空间。这些项目的成功有赖于三方的协作。首先是由政府委派、专员管理的项目总承包商。总承包商有权决定城市公共空间的区位，而区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公共空间所应承担的文化内涵。公共空间周围的建筑、地标和公共艺术品的可达性和可读性都将成为该公共空间的建造要素。

第二个参与方是城市艺术家。他们在创作城市艺术品的时候须要综合考虑场所的特定条件、规划限制和景观布置。他们所设计的艺术品是城市区域文脉的具体表达，也是公共空间场所精神（genius loci）的物质载体。艺术品所传达的标志性的、美学的、情感的、甚至具有一定启发性的信息，为城市公共空间营造了一种富有诗意和想象空间的环境氛围。

第三个参与方是使用者。城市使用者期待城市能为其提供环境舒适、功能适宜、富有魅力且兼具生态、景观内涵的城市空间和服务。将城市公共空间与艺术相结合的策略可以吸引不同背景的人群，从而促进城市使用者的交流。在这些城市公共空间中蕴含着一种“文化的民主”：人们因为户外的公共艺术而相聚，而城市文化则在这每一次平等的相聚中生长。

二 创造型城市和“3P”原则

20世纪80年代，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首次提出以文化产业为主导的创造型城市概念，旨在反对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的颇为激进的旧工业转型政策。当时的英国“新左翼”（New Left Wing）阵营将创造型城市的概念视为一种政治工具，希望借助此概念增强多种族混居地区的社会凝聚力，以提高其政党在该区域的支持率。创造型城市理念主要通过编

制城市公共政策（例如文化产业规划）、评估文化资源、明确文化产业消费类型、建立公共文化设施和机构、扶植城市艺术家工坊等措施来实现其促进社会文化的目标。

创新型城市的核心概念可以概括为三种创新的结合，即实践（Practices）、政策（Policies）和协作（Partnerships）^[3]，简称为“3P”原则。这三种概念的结合作为促进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理念和工具，例如以建立文化基金会的方式为重大的文化议题提供专业咨询，通过政策倾斜鼓励新兴的艺术产业，同时促进文化艺术消费。

实现创新型城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核心问题包括，如何在保留旧工业遗产的同时实现场地文化价值重构、平衡城市中心与城郊的不均衡发展、挖掘城市的旅游资源和文化基础设施配置等。

法国的里尔市和马塞市分别在2005年和2013年当选“欧洲文化之都”。在欧洲文化之都评选活动的促进下，以上述城市为代表的法国城市逐渐建立起一套以“文化协作”（cultural cooperation）为框架的整合型区域发展策略。例如里尔市标志性的科学-商业-艺术城市轴线，使里尔市享有“未来艺术之城”的美誉；于2013年当选“欧洲文化之都”的马赛市则在城市中选择11个“创意园区”（Creative Areas），通过建立11位艺术家和城市管理部门（National Agency for Urban Requalification, ANRU）的合作，借助文化艺术产业促进城市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巴黎的“巴黎都市”（Paris Metropolis）组织提出了大巴黎区域作为城市“创意生态系统”（creative ecosystem）的全新文化概念。截至2011年底，该组织对巴黎超过70处旧工业废弃用地进行了生态文化改造。这些项目的核心理念来源于上文提及的德国“国际建筑展”（IBA）项目（1979-1987）。在德国柏林举办的“国际建筑展”遵循两个原则：精细化城市改造和谨慎重建。在该原则的指导下，后续的IBA Ermscher公园（1989-1999）和IBA See景观项目（2000-2010）将一片具有50年采矿历史的废弃用地改造成一处特别的城市景观。以这些工业改造项目为代表的城市复兴计划，不论尺度和时间跨度，都传达出一种谨慎、敏感对待城市肌理和文脉的态度。在这些计划中，政府并未采用自上而下的传统手段对场地进行武断的干预和随意的重建，而是鼓励多层次、多专业的协同合作，尊重城市区域特有的社会文化属性，以一种艺术性的创造来再现场所精神（图2）。

三 可持续性发展与文化遗产

“文化常依赖于某种可感知的形式得以传

承，例如书籍、绘画、雕塑、音乐和建筑。这种传承超越了个体或文明的存在时间，永续不竭。”^[2]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城市是城市公共空间与艺术相结合的不朽典范。传统的城市公共空间好比一本厚重的史书，向市民和游客传达着场地、区域乃至整个城市的文化历史。传统的城市公共空间常常以纪念性雕塑为中心，这些雕塑可能是为了纪念某位杰出的政治家、战斗英雄、民主斗士或是为科学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由于这些纪念性雕塑的存在，其所处的公共空间往往也被赋予了与之呼应的场所精神。

城市中的文化遗产种类繁多，例如纪念性雕塑、历史建筑、旧工业建筑及各种民俗仪式等。这些文化遗产不仅是作为一种物质存在，还是人类无穷创造力和漫长历史的写照。1789年，第一部专门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法令在法国颁布。法令颁布时正值法国大革命时期，大量珍贵的历史建筑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部法令的颁布保护了那些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遗产。该法令提出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三大主题：遗产修复与保护、遗产管理和遗产作为文化、教育、旅游资源的再开发。

法国人文地理学家保罗·克拉瓦尔（Paul Claval）指出：“人类世界是依赖文化传承而不断进步的。”文化为我们解释过去、指导当下并预示未来。保罗·克拉瓦尔认为文化具有“同一性和领域性”（identity and territoriality），是某种特定社会阶级“具有标志性的建构”。文化事实（cultural fact）作为城市现实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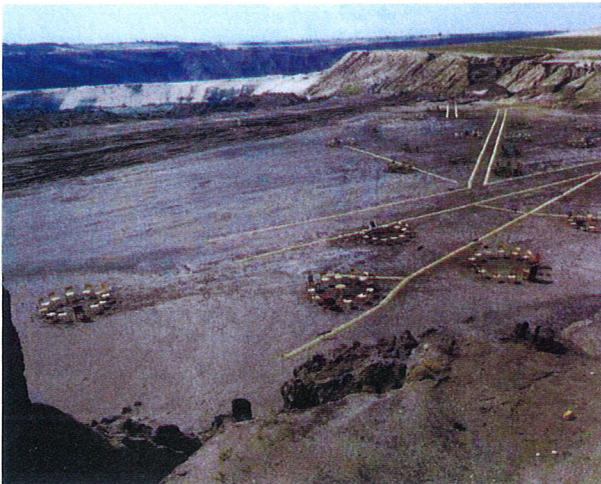
以创造、生产或是艺术的形式被人们所感知。抽象的城市文化有两种实物化的表现形式：首先，各种不同类型的空间和建筑（例如剧院、教堂、博物馆和花园等）将城市文化物化为文化实体（cultural objects）；其次，各种文化活动和事件通过信息交换的方式促进城市文化在社会中横向（人与人之间）及纵向（时代与时代之间）的传播。在文化实体上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具有明显的领域性，专属于某个特定区域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城市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实现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所不应忽略的要素^[1]。

城市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力的结晶²。“每一个文化实体都是一个具有生命的实体，它以无形的方式存在于时间中，但是却以有形的方式影响着所属群体中的每一个人。文化实体的类型极其多样，可以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功能，例如图腾崇拜、殡葬或祭祀，也可以是某种具体的文化理论。”^[4]

在法国，城市公共空间中的雕塑、地铁站中的诗歌海报都是城市对于无法触及的非物质文化的积极回应。例如巴黎协和地铁站中象征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还有布列塔尼市奥德梅尔桥（Pont-Audemer）广场上仿照传统蕾丝图案的铺地。保存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油印馆中的老式绘画，印刷在有轨电车票上的油画，城市文化就是在这些点滴细节中得以再现和重生（图3）。

四 文化转向

文化是无法完全脱离现实世界而独立存在的。最近，欧洲越来越多的文化组织和机构提出



2 IBA-See景观项目A Missing Village (Jürg Montalto, 2005)



3 巴黎协和地铁站内瓷砖上印有《世界人权宣言》

了“文化公民化”（cultural democratization）的概念。该概念来自于20世纪60至80年代发生在西方国家的“文化转折”（cultural turn）运动。伴随着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和社会草根阶层的兴起，来自社会草根阶层的呼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草根阶层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集体行为模式和宗教信仰；他们在社会中专属的形象和标识（sign）系统都是社会基础功能的一部分。以人为本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而尊重社会的多阶层属性则是以人为本原则的前提。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人类发展与经济福利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曾指出：公平社会要求社会为每一个成员或阶级提供平等的选择能力；这种选择能力不仅仅体现在选项的数量上，还在于为个体自主决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执行空间。全社会协作（social

partnership）的概念不仅仅是形式上多种社会等级的并置，而是一种自发的、多元的社会关系。在这种自主的社会关系中，各身份、阶层的人们不再是社会信息或制度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积极个体^[6]。森所倡导的社会经济发展策略以提高社会成员的实际能力（capability）为宗旨；在经济政策的编制过程中，应该充分评估政策对个体及社会群体福利的影响^[6]。

“建立公平社会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如何实现政策编制的透明化；政策的审核与评估应该充分考虑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通过添加与社会文化及哲学相关的量化评价指标来体现政策对于社会文化性的尊重。”^[7]

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方针和政策参与者的多方协作将有助于实现社会的文化性转变。自下而上的政策方针能够充分发动当地居民的政策参与

积极性，有助于明确政策需求与目标；而多方协作能够平衡政策参与者的利益分配，有助于评估政策在不同空间及文化尺度下的潜在影响。

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往往将社会系统本身的结构和制度作为研究的主体，然而要建设现实中的公民社会，意味着须要充分考虑每一位社会成员的需求。阿兰·特莱尼（Alain Touraine）在他的著作*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Today's World*中为城市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学范式，即基于系统本身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应该让位于基于行为个体的新研究范式；实现公民社会的要旨在于不断提高社会个体及集体的实际能力^[8]。

五 文化与可持续发展

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城市文

化研究的热点。文化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需要以某种物质的方式被人感知和传承。汉纳·阿伦兹（Hannah Arendt）认为虽然文化商品本身难免具有一定的消费主义色彩，但物质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却可以超越个人或是时代的限制得以永续；可传承性似乎是文化所具备的基本属性^[4]。

18~19世纪的可持续性概念还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从区域到国家，甚至全球的政府都在关注如何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对生态、环境及社会可持续性的关注直到20世纪才慢慢出现。虽然1987年的《布伦特兰报告》（*Brundtland Report*）和1992年的里约地球峰会（*Earth Summit*）都以纲领的形式指出广义的可持续性发展包括经济、环境及社会三大方面，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以经济可持续性为主、以环境及社会可持续性为辅的等级观念仍是主流。经济优先的可持续性观念导致政府过分依赖于运用技术手段来解决城市问题，而忽略了社会及文化因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在制订中远期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时，往往将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例如居民收入增长、就业及出口增长等），其次是环境保护（例如生态及矿产资源管理），最后才是社会公平（居民健康、教育及扶贫问题）。城市的文化性往往被忽略，或者被视为实现其他可持续性目标的工具。

法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将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模糊关系，比喻为诗与文的关系^[5]。当代可持续发展概念被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们主导，以

现实技术解决具体问题为主要表现形式，犹如诗文；而社会的文化性则类似于诗歌，可感而不可及，是一种象征性或哲学性的表达。现今以经济为导向的可持续性概念常将社会文化视为社会文化商品的生产与消费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商品化与前文所述的文化公民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文化商品化是片面的可持续性概念对社会文化价值的过度简化和压缩。在忽视文化核心价值可持续性策略中，社会文化常常被等同于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或者只是为了给缺乏“灵魂”的技术可持续性披上文化的外衣。这种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战略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的时代要求，重视文化的核心价值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如果将社会的发展过程理解为知识与文化通过物质载体实现传承和自我更新的过程，那么深入研究社会文化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物质空间与文化传播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实现技术与文化的融合。我们必须依赖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合作，促进政策制定者将这种多元的可持续性知识体系与技术政策相结合。多专业、多领域的通力协作是实现社会可持续性的前提条件。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以报告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指明文化在人类可持续发展框架中的核心价值；2004年，由国际组织UCLG³（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提出的《21世纪文化纲领》（*Agenda 21 for Culture*）号召地方政府在制订当地战略规划时将文化发展议题作为政策编制的核心，并规定UCLG

组织内的政府须将每项公共工程投资总额的1%划分出来专门用于文化设施建设。《21世纪文化纲领》鼓励艺术家参与城市公共空间建设，鼓励通过艺术手段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鼓励音乐、电影及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如艺术节）与城市公共空间相结合；鼓励向公众开放城市文化遗产。

在法国，《2010-2013国家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报告》（*National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0-2013*）将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多样性等文化可持续性议题纳入国家级的发展战略框架中；各地地方政府和社会机构可依据该报告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的可持续性发展规划。该报告所描述的文化可持续性框架与《21世纪文化纲领》相得益彰。

经过近10年的城市实践，《21世纪文化纲领》中所描述的许多城市愿景已逐步在欧洲大陆上成为现实。本文简要列举了在《21世纪文化纲领》中已经实现的政策目标：（第17节）通过文化交流与传播，保护城市现有的文化多样性；（第18节）鼓励创新，提高文化产品及服务的质量，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第23节）保持地域性的文化传统，尊重传统社区的空间肌理和历史文脉；（第26节）在城市建设或更新项目中，通过法律法规的手段保护当地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环境保护与经济结合发展创造了绿色经济的概念；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创造了社会经济的概念；而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融合则诞生了“紫色经济”（purple economy）的概念。紫色经济提倡从文化价值的角度重新审视城市的经济发

4 土耳其伊兹密尔卡迪费卡莱城堡遗址上的公共艺术“图片城市”（Maro Avrabou & Dimitrixenakis）

5 法国伊夫里“Trans 305”项目（Stefan Shankland）



展策略,有助于决策者跳出片面关注“数字”增长的发展窠臼,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内涵。

六 紫色经济,文化足迹和创造型经济

紫色经济是一种以文化价值为主导的经济类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紫色经济尊重人类及文化的多样性,从文化价值的视角重新审视以商品和服务消费为代表的资本社会^[10]。

紫色经济的概念与绿色经济密不可分。如果我们把文化的全球化视为一种水平向的文化价值标准,那么对于环境质量和资源的关注,则构成了一种垂直向的可持续性维度。类似于大家熟知的生态足迹的概念,文化足迹(cultural footprint)表征了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对于文化环境的整体影响。以人为本的可持续性概念要求以提高人的福祉作为社会改造的根本目标。紫色经济与绿色经济的结合,可以在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各种文化政策及活动增强当地居民的归属感,提高区域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城市区域是衔接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键纽带。

依据UNESCO的定义,创新型经济是指以领域文化创意产业为主导的一种经济类型。文化创意产业包含艺术、文化、商业和技术等多领域,以提供文化商品、服务及文化资本的形式,促进区域内其他基础产业的发展。繁荣的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整合区域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资源,塑造具有文化内涵的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的吸引力从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将城市历史遗产区域(例如旧工业区)改造成“创意园区”(creative district)是实现创新型经济的有效手段。以文化创意产业为核心的城市更新策略能够为城市遗产找寻新的经济和文化增长点,改善城市面貌。常见的文化创意产业包括:艺术工作室、艺术交易市场、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出版业、视觉艺术(电影、摄影、电视)、手工业、音乐、表演艺术(歌剧、舞蹈、戏剧)、时尚、广告业、软件工程、项目策划和美食艺术等。

城市更新与创新型经济的结合,已经在许多欧洲城市中结出硕果(例如德国鲁尔地区、法国波尔多市)。创新型经济将文化重新注入空间物质遗产之中,有助于吸引外来投资,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艺术家、建筑师将城市公共空间及基础设施从一种纯粹的功能性需求,转变为一种具有文化价值的城市形象,这是创新型经济与城市更新相结合的典型特征。

七 艺术家与城市精神

艺术对于城市文化传播和集体记忆的塑造具

有重要的作用。艺术品以实物的形式实现人们与抽象的艺术直接“接触”,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城市文化场所具有一定的文化示范效应,会影响周边城市空间的发展,例如群聚的咖啡厅、餐馆、画廊、商店、艺术家工作室和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都将提升区域内的地产价格。

城市与艺术家的关系曾发生多次转折。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艺术家喜欢将艺术创作与具体的城市功能相结合。对艺术家来说,城市是一个激发灵感,进行试验性创作的温室。许多艺术家花几个月的时间旅居在一座城市,以充分感知和捕捉城市精神;而城市因为这些艺术家的存在,其空间、文化环境也在渐渐发生变化。公共艺术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其灵感常来自于市民文化记忆与城市公共空间之间的互动(图4)。

“公共艺术”一词在人们心中往往与闪耀、短暂、即时等形容词相联系,在法语中有一个有趣的比喻——“蛋糕上的樱桃”,形容一件作品最后的一道点缀,美好却无实质性内涵。虽然19世纪城市的公共空间艺术大多类似于“蛋糕上的樱桃”(例如广场中间的雕塑或艺术品),但如今的城市公共艺术已从一种单纯的形式语言上升为与城市功能的高度融合。一方面,公共艺术尊重城市空间的基本功能属性,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回应空间功能;另一方面,公共艺术以其本身具有的功能协助城市管理。以城郊住区为例,传统的城郊住区由于缺乏投资,公共设施维护较差,公共空间缺乏;城市艺术家通过精心设置的艺术装置,以较低的成本为当地居民创造了适宜的公共空间;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艺术装置唤起了当地居民的共鸣,居民们开始尊重并主动维护公共空间的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艺术的存在,填补了传统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空白,让那些缺乏“照顾”(care)的社会群体和城市区域获得应有的归属感和领域感。公共艺术调和了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城市文化和空间发展的矛盾,使空间从抽象的地理学概念升华为一种现象学的存在。公共艺术还将场所的身份与历史锚固于空间之中,成为场所乃至城市精神的载体。

如果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功能需求的一部分,那么公共艺术则是一种重要的城市美学需求。公共艺术能够影响人们对城市空间的使用方式和体验,因此越来越多的城市艺术家开始关注艺术在塑造城市公共空间、调和社会文化发展矛盾中的重要作用。由公共艺术家斯蒂芬·尚克兰(Stefan Shankland)负责的法国伊夫里市的“Trans 305”项目尝试将公共艺术的内涵扩展至艺术物件之外,通过教学、表演、展览、工作坊等方式展示城市领域文化的原创性,在更大的城

市空间尺度下探索如何实现城市文化、艺术与城市空间改造的融合(图5)。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积累和实现世界范围的贸易自由为标志,而现代城市在这种片面强调商品积累的发展策略下,已经开始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及环境问题。本文从理论出发,结合具体的城市实践,介绍了城市的文化性及公共艺术对于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对城市文化性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完善现有的可持续发展框架,实现社会、文化、经济三方面协调共进的全方位可持续性。[11]

本文作者为同济大学单位为同济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作者杨宇振所在单位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图片来源:图1引自http://art-magazine.de;图2由Stephen Rauscher捐赠;图3-5为基本家捐赠。

注释

- ① The notion of intangible heritage appeared at the early 90th after the UNESCO recommendation about traditional culture protection (Barcelona, 1989).
- ② 参见: *Agenda "1 for Culture"*.
- ③ UCLG成立于2004年5月,是世界上最大的由各个地方政府组成的国际组织。该组织的成立宗旨是维护地方政府的民主和自治权利,同时作为地方政府的代表出席各种国际会议及论坛。

参考文献

- [1] Janicot D. Cultural Dimension of the Greater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12.
- [2] Arendt H. The Great in Culture (1964). Paris: Gallimard, 1972.
- [3] Schwartz J.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Culture). Symposium of the Observatory for the Cultural Policies. Paris, 2012.
- [4] Sironi F. Devolution Strategies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Nature of the Attacks Against the Cultural Object. Review Nord-Sud, n°12, L'es publisher, 1992.
- [5] Long M. From Paradigm Lost to Paradigm Regain: The Case for an Actor-Orientated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European Review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1990(49): 3-24.
- [6] 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7] Indicateur de Valeurs, labo Culture et Développement Durable. <http://www.reseauculture21.fr/laboculture>, 2014-11-05.
- [8] Touraine A. New Paradigme for Understanding Today's Wor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 [9] Moum E. La Voie, pour l'avenir de l'humanité. Paris: Athéna Fayard, 2011.
- [10] Dhabri A. The Cultural Challenges for the Global Economy. http://www.economiamauve.org/economiamauve_diversum_3.html, 2013-12-09.

收稿日期 2013-10-11